

# 胡绳文集

1979—1994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53  
29

90294

DH1992.12.27

# 胡 绳 文 集

(1979—19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北京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文集:1979~1994/胡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2

ISBN 7-5004-1567-2

I . 胡… II . 胡… III . 胡绳-文集-1979~1994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74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科技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5 插页:2

字数:448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35.00 元



## 前　　言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 1979 年以后，也就是在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渐渐苏醒过来以后写的文章。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 1994 年 4 月。

在我 77 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因此，如果把我的写作生涯分期，那恐怕应该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期一样。我认为，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49 年全国大陆解放以前。这一时期的文集，已经编成了《胡绳文集（1935—1948）》。我在 1991 年的一个谈话（收在这本文集的附录的最后一篇）中，对这一集的内容略有说明。第二个时期，是 1949 年到 1965 年，这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本来应该包括在这一时期中，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十年几乎是个空白。第三个时期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不过在“文革”还未终了时，从 1973 年起，我以全部精力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专著。所以本来应该从 1976 年开始的第三个时期中的最初几年，我没写什么单篇文章。第二个时期的部分文章，曾出过一个名叫《枣下论丛》的集子。因为一些原因，我暂时不想把第二个时期的文章汇编成集。所以先

编第三个时期的文章。第三个时期在 1987 年前的部分文章，也曾出过名为《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集子。现在奉献给读书界的这本文集，已把《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部分文章收集在内了。

这本文集中间，除了附录的三篇以外，共有四辑。第一辑可以说都是政论文章。虽然这里有的是读书笔记或某本书的读后感，但都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第二辑是史事的评论。其中有十篇是新中国建立前的近代中国的史事，最后一篇是讨论关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第三辑可以叫做论学的文章，其中又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第二组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第三组是关于中共党史的。最后的第四辑是收入了不能分到前三辑中的文章，和虽然也可以分到前三辑的某一辑，但都是篇幅较小的短文。在 1979 年以后这个时期内，我还写了些忆念和评论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和已过世的朋友的文章。这些文章另编成《先贤和故友》一个集子，和这本文集同时出版。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发表过。文章后附记的原载某刊某报，是指它首次发表处。也有些文章只是在某个会议上讲过，还没有以文字形式发表过。还有一两篇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

至于文章排列的次序，第一辑、第三辑各组和第四辑是按照写作的时间的先后，第二辑是按照所论述的史事的时间的先后。

自己把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后，我觉得这些文章多少还能提出一些可以注意的看法，一些可以深入研讨的问题。对于我所提出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本来应该展开充分的论证，而我只能提出一些粗糙的说明。这固然因为已届老年受精力所限，但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到不安和惭愧。

这本文集中收入的《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一文，虽然以

我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国际问题的  
几位同志合作的产物。这一点是要在此声明的。

胡 绳

1994年6月20日

# 目 录

## 第一辑

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 (1982年8月) .....	(3)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3年2月) .....	(9)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1983年3月) .....	(17)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7年2月) .....	(33)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纽约向美国知识界人士作的讲演	
(1987年4月) .....	(52)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1990年7月) .....	(58)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1990年8月) .....	(69)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 (1990年9月) .....	(76)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1990年12月) .....	(83)
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1991年9月) .....	(89)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在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演讲 (1991年11月) .....	(98)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在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992年2月) .....	(113)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 读书笔记（1992年4月） ..... (118)
- 关于防“左”（1992年4月） ..... (129)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1992年10月） ..... (140)
- 关于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两篇）（1991年6月，1993年7月） ..... (150)

##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1993年12月） ..... (168)
- 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1993年12月） ..... (183)
-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4年3—4月) ..... (191)

## 第二辑

-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1990年6月） ..... (215)
-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1981年10月） ..... (223)
-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在东京向日本朋友作的演讲  
(1981年10月) ..... (234)
-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1981年10月) ..... (242)
-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1979年4月） ..... (259)
- “五四”和反封建（1989年5月） ..... (283)
-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1984年11月） ..... (302)
-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91年9月） ..... (312)
-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1987年7月） ..... (316)
- 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1985年8月） ..... (3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1989年5月） ..... (330)

### 第三辑

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985年8月、12月） ..... (339)

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1986年10月） ..... (354)

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1986年12月） ..... (365)

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1988年4月） ..... (373)

谈谈社会学研究（两篇）

（1986年4月，1990年3月） ..... (390)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1981年3月） ..... (401)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1982年4月） ..... (415)

从中国近代史中学习什么（1983年2月） ..... (421)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5年5月） ..... (429)

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1985年8月） ..... (434)

谈党史研究工作（1983年12月） ..... (441)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1987年8月） ..... (452)

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4月） ..... (470)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1991年10月） ..... (478)

### 第四辑

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82年4月） ..... (487)

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1982年12月）	（489）
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1984年6月）	（498）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1985年1月）	（500）
共同的理想（1986年9月）	（504）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 （1987年6月）	（508）
对社会科学出版工作的几点希望（1987年6月）	（510）
我们赞同推广世界语（1987年6月）	（512）
以坚定的立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1990年4月）	（514）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科学（1991年1月）	（519）
寄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1992年9月）	（522）
现代汉语词典工作者的任务（1993年4月）	（525）

## 附录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六版序言	（53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	（533）
谈《胡绳文集（1935—1948）》	（538）

# 第一辑



## 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十一大以后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年举行的。六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生活各方面说来，逐步清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问题，使一切工作转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在解决中，或者还没有解决好，还有许多现象不能使人满意。但总的看来，的确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人们公认的。

十二大在这样一个时候召开的重要性，可以和历史对比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变。第一次是北伐战争以后。我们党 1924 年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使革命得到很大的发展。那时我们党刚成立不到四年。从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建党，发展到 1927 年有了六万党员。这个新生的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已经走到绝路，和共产党合作后，才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可是，1927 年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叛变革命遭到了大失败。这次失败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扭转了这个局面。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发展农村根据地，走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同志也纷纷发动农村起义，使革命重新发展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革命

根据地。第一次转变，就是指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农村革命重新大开展。

1931年以后，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使我们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的失败，遭到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说苏区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百分之百都损失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新得到发展。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运动兴起了，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我们党的力量和中国革命重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次大转变。

在这两次历史性大转变中，当革命遭受挫折、遭受失败的时候，不但敌人认为我们的失败无可挽救，党内也有人发生动摇。背叛党成为托派的一些人（包括陈独秀等人）在红军长征时说，共产党根本路线错了，无产阶级政党怎么能跑到边远的农村去，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还说我们党搞什么农民游击战争，必然失败，不可救药。但是我们党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这两次失败都教育了我们的同志，使我们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杰出人物的领导下，以革命的胆识，坚韧的毅力，正确的战略战术，顽强地继续进行斗争，扭转失败的形势，使革命事业获得新生，重新开创出新的局面。

历史不能简单类推，但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人们通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当然，不能说凡是失败都会变为成功。如果是根本违背历史潮流的，和人民的利益相违反的事业，失败就是失败。如法西斯战争的失败，就是失败。它的失败，意味着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正义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失败确是成功之母。这就是说，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会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可能从挫折和失败的形势下转变为胜利。不过要使这种可能性实现，还必须有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的正确认识：要能够科学地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斗争历史（包括成功和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的认识，

改正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前两次转变都是这样的。1927年革命失败后，我们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中国革命必须首先以农村为根据地逐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后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继续不断地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纠正“左”倾错误。在批判、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得到新的认识，在这种新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团结了全党。在新的水平上，我们党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这就使得挫折和失败转变为胜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我们总结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取得教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其中有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问题，又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错误。在分析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不能不牵涉到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党有没有勇气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能不能把这种自我批评做得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时产生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凡是毛泽东讲过的话都不能怀疑，凡是毛泽东做过的事都不能非议。这样我们就没法总结经验，不可能对于过去的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不但他晚年错误，好像他一生都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对于总结经验也是十分不利的。按照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否定了。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是靠全党的努力，党的许多领导人物的努力，而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一切，那就实际上等于

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我们党几十年来的一切成就，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我们党是不利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六中全会，我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的观念；从组织上又进行了很多工作，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许多问题；重申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年6月举行的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史经验，涉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总结。十二大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转变的关头举行的。这次会议将对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取得的许多成就加以总结，继续解决还未解决的问题，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把这几年的历史大转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革命大转变对照一下，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二大所处的地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历史对比。我党取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曾经经过了二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在二十多年中间，有成功，也有挫折，有失败，一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党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从思想上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七大不但使我们党能够团结一致地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还可以回头看一下，七大以前17年，1928年举行的六大，对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完备，而且这些认识并没有变成全党的统一认识，也没有把这些原则的规定具体化。因此，六大以后，仍然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后是为时四年多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总之，六大以后中国革命仍然走了曲折的道路。